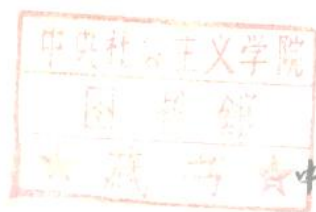


〔英〕 迈克尔·埃尔曼 著

江春泽 译 秋亭 春义 校

社会主义 计划工作



★ 秋亭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210
7

70168



200071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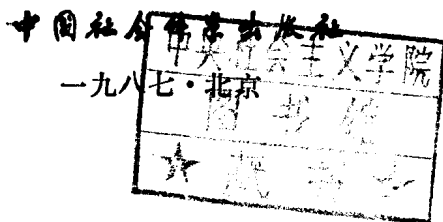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计划工作

〔英〕迈克尔·埃尔曼 著

江 春 泽 译

秋亭、春义 校

DI77/3427



责任编辑：韩育良
责任校对：刘进珍
封面设计：张 明
版式设计：王丹丹

社会主义计划工作
SHEHUI ZHUYI JIHUA GONGZU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23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5004-0243-0/F-58 定价1.80元

SOCIALIST PLANNING

Michael Ell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译出。

译者的话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要求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计划体制，并且相应改革计划方法，充分重视经济信息和预测，提高计划的科学性。为了帮助广大经济工作者更好地总结我国和外国计划工作的历史经验，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和外国学术成果的原则，我将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埃尔曼著的剑桥大学的现代经济学丛书之一——《社会主义计划工作》译成中文本献给读者。

西方的学术成果总的来说是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为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的。但本书作者认为自己“是严肃地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未必完全赞同他的说法，但作者这种热情和愿望总是值得欢迎的。他们把比较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对不同国别与地区、不同类型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现象的异同所作的描述和静态与动态的研究，尤

其是从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特征的角度，揭示传统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对我们考虑正在深化的改革，还是有研究价值和借鉴参考作用的。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①我们应当象马克思当年那样，“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

^①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

能得出的结论”。^①

本书是日本经济学家佐藤经明1980年访华时赠予的。作者完稿于1978年1月，书中所提到的中国情况，显然没有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尽管如此，本书对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计划体制改革仍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在本书译校过程中曾得到樊亢、史敏、侯国清等同志指正与热情帮助。王冬平同志为我做过一些技术性的校订工作。此外，吴必红、吴于宁、吴列莎、谢丽在誊写方面也费了不少功夫。我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翻译工作是从1981年初开始的，由于某些工作上的原因，推迟了与读者见面的时间，深感内疚。

江春泽 1984年10月于北京

^①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

《剑桥现代经济学丛书》

前 言

本书是剑桥大学的现代经济学丛书之一。编著这套丛书的目的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梅纳德·凯恩斯创办的剑桥经济学手册丛书相似，而且是以同样的精神设计的。凯恩斯的丛书，正如他本人在引言中所阐明的那样，是希望“向普通读者和尚未入门的大学生传授经济学家当前用于解释经济问题的一般思想原则的若干概念”。接着凯恩斯介绍说，那套丛书的作者，一般地说都是“剑桥学派的正统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多数观点和见解是“从以往五十年间对剑桥思想产生主要影响的两位经济学家马歇尔博士和皮古教授那里汲取的”。丛书的作者“注意不使用难懂的概念，更注意避免使用晦涩的表达方式”。

这套简明的专题丛书也是以理解力强的大学生和对经济学有兴趣的一般读者为对象，但它在三个主要方面不同于凯恩斯丛书：

首先，它的注意力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段时期里，特别引起经济学家兴趣的一些经济学课题；

第二，它的作者们虽仍具有剑桥的思想传统，但他们认为自己主要是从凯恩斯本人及其直接继承人那里，而不是从剑桥学派的新古典派一代人那里得到启示的；

第三，它面向的读者比较广泛，不限于成熟资本主义经济的读者，而且同样地以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生为对象。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与影响，有助于形成

了近几十年来在经济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经济学观点。

最后，还应当说明的是，这套现代剑桥经济学丛书的编辑和作者所陈述的经济学说的领域要比本世纪二十年代凯恩斯所涉及的剑桥学派经济学更加广泛。然而，这套丛书的目的不是宣传什么独特的理论教条，而是激发大学生们不要受老一套理论成规的束缚，要去思考那些对他们来说是活生生的有争论的问题。

菲利浦·迪恩

高塔姆·马瑟

琼·鲁宾逊

致中国读者的前言^{*}

我的《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一书现在能致用于中国读者，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本书的英文初版是作为《现代剑桥经济学丛书》的一部分而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丛书的对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生和有志趣的大众读者。丛书的作者是因在经济分析的发展方面具有共同的剑桥观点而组合起来的。

《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一书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其独创性。

第一、理论结合实际。计划理论的专著和描述计划经济的书籍数量都不少，然而，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将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实际发展的描述相结合。例如，该书第三章就把计划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描述和对造成问题原因的分析结合起来。

第二、在方法上，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别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流行的正统观点。在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均衡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的教科书大量地运用了这种正统理论，其结果是，作者们往往不能弄懂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决策。而我的著作则是严肃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经典作家的说法。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的理论，现实则必须用马列主义观点去解释，而我的著作却兼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际的经验这两个方面，并且运用后者去适当地修改和摒弃前者。

- 1985年11月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苏联东欧学科第三次世界大会上，我遇到了M·埃尔曼教授。译者与作者在第三国意外相会，双方都很高兴。当他知道自己著作的中译本即将问世时，表示要给中国读者补充一个《前言》。11月18日，我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收到了他从阿姆斯特丹寄来的《前言》，当天译成中文，寄回国内，以便赶在付印之前。——译者注

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它已经成为一本国际性的教科书。英文版在说英语的国家被采用，并于1980、1982和1983年多次重印。在欧洲，1980年被译成荷兰语出版，1981年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在拉丁美洲，葡萄牙文译本于1980年在巴西出版，西班牙文译本于1983年在墨西哥出版。在亚洲，日语译本于1982年问世。

读者可能关心我本人的情况，这里简要介绍几句。我是英国人，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获伦敦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接着，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进修两年，研究数学方法在经济计划工作中的应用。随后，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两年，担任经济学讲师、即助理教授。后来又转到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的经济研究所做了六年研究工作，研究领域是苏联经济。在剑桥，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写了不少文章。1975年，我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系工作，先是副教授，从1978年起是正教授。我的教学领域是中央计划经济和比较经济体制。

除这本书外，我的主要著作有：《苏联计划工作的问题和数学方法对解决这些问题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学：集体化、趋同和资本主义》（伦敦学术出版社，1984年）。第一本书是关于数学方法在苏联经济计划工作中应用的专著，集中研究在计划工作中使用数学方法使经济运行所能达到的实际改善程度。第二本书汇集了我撰写过的各种题目的论文。我为人所知是由于我的论苏联经济改革、苏联计划工作中的数学方法、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西欧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的著作。

我是美国《数理经济》杂志编辑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该杂志把苏联的数理经济文献译为英语。我也是《剑桥经济学杂志》的副编审。我还为联合国、荷兰和加拿大政府、高级研究机构国际联合会等团体做过咨询工作。在比较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领域里，我被普遍认为是世界领先的权威之一。

显而易见，我对苏联比对中国更了解。我在书中关于中国的某些看法可能使你们感到是片面的、不适当的。当然，很多中国读者都比我对中国的实际更熟悉，但是，我希望和料想，置中国经验于国际视界里作比较将是有益的。我关心地注视着中国的情况，书出版后即访问了中国（1979年），那次是作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系师生访问团的团长去的。访华期间，我曾有机会在上海和北京讲学。我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再访中国，讲学和会见同行们。

1979年出版的这本书写作于1974—1978年。在那以后，发生了许多事情，中国的事态变化更大。如果我今天来写这本书，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涉及到中国的方面将大不相同了。然而，需要重写的只是描述的部分，使之更时新。理论的核心则仍然相同，它已经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保持其有效性。

迈克尔·埃尔曼

于阿姆斯特丹大学1985年11月11日

本书前言

本书的目的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学作简明的介绍。本书与西方用英语的国家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工作和比较经济体制的大多数书籍相比，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它不是采用一般均衡理论，而是严肃地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评判经济体制的标准。本书也不同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工作和比较经济体制的大多数著作，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来对待，可以根据经验而改变或舍弃其某些结论。本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永远正确的教条，并认为毋需由权威来经常解释它的准确含义。

本书试图用不大的篇幅来总结许多国家在六十年里的经验。它涉及大量的课题。因此不可能对每个问题作深入的探讨，也不可能论及每一课题的各个方面，更不可能象一本详尽论著那样细述一切。笔者也为在许多方面过于简单而感内疚。本书集中写了两个国家——苏联和中国，而很少论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古巴、越南这些国家的令人感兴趣的经验。这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之所以集中写苏联和中国，是因为它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重要的国家。苏联是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的国家，它的经验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许多国家都是仿效苏联的模式而建立起它们的制度的；而且以苏联的计划工作作为模式，形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政治运动。中国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本书每章后面附有建议进一步阅读的书目，供愿意继续探讨本书所涉及论题的读者参考。

鉴于统计数字不足和多数作者的偏见，读者也许会怀疑，怎

么能写出一本论述这个问题的严谨著作。确实，要想获得可用的统计数字多半是难以如愿的。中国许多关键时期的数字（例如人口和农业产量数字）有很大的误差。在许多重要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指出所不知道的主要方面。至于苏联，尽管有些数据（例如关于职业病和事故、犯罪、近几年集体农庄市场的价格）也是缺乏的，但整个说来资料是丰富的。当然，对于这些资料确实应该批判地对待。例如，众所周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国防开支和三十年代严重疾病的数据是为了在国外制造假象而捏造的。此外，苏联农业产量的统计数字与其他国家类似的统计数字是不可比的。尽管如此，苏联还是有一些上等的统计数字，诸如1928—1930年物质产品的价值，它们是国民收入核算的历史里程碑。至于说到偏见，这其实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许多著作里偏见是如此之明显以致成为可笑。此外，近几年在一些国家出版了许多专著和学术论文，这使我们增长了鉴别能力。我非常感谢这些作者，没有他们的工作，我这本书就不可能问世。我希望通过细心探究现在可获得的数据，能够阐明本书所要讨论的课题。由于资料所限，这本书仅仅是一个中间性的研究成果，许多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调查研究。这些问题包括：标准化的不同制度社会指标的计算；中国的粮食、人口、收入分配和营养等方面改善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安全数据；以及劳动者精神面貌的国际比较研究。

作者在与同行们的反复讨论中得益非浅。特别是马赫穆德·阿布德尔—费迪尔 (Mahmoud Abdel-Fadil)，W·布鲁斯 (Wlodzimierz Brus)，克里斯·戴维斯 (Chris Davis)，菲莉斯·迪恩 (Phyllis Deane)，汉斯·范登·多伊尔 (Hans vanden Doel)，帕特里查·埃尔曼 (Patricia Ellman)，斯坦尼斯拉夫·哥穆尔卡 (Stanislaw Gomulka)，杰克·格雷 (Jack Gray)，菲利普·汉森 (Philip Hanson)，克里斯托弗·豪 (Christopher Howe)，鲁德·诺克 (Ruud Knaack)，迈克尔·马萨奇

(Michael Masuch), 亚历克·诺夫 (Alec Nove), 琼·鲁宾逊 (Joan Robinson), 桑德·史密斯 (Sandy Smith) 和罗杰尔·塔林 (Roger Tarling) 的评论、批评和建议很有帮助。此外, 我还要感谢伯明翰大学苏联与东欧研究中心的主任、全体工作人员和该校的图书馆, 阿姆斯特丹大学东欧研究所的所长、全体工作人员和该校图书馆, 剑桥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经济学院等给予我的鼓励和帮助。

遗憾的是, 笔者找不到中性的术语来讨论本书论及的问题。苏联认为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 而中国则认为世界一分为三, 即帝国主义 (美国) 和社会帝国主义 (苏联) 国家, 第二等的资本主义国家 (西欧和日本), 以及第三世界 (除日本以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西方同苏联一样, 认为世界一分为二, 只是说法不同。它不使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采用“混合经济”和“中央计划 (或管理)”这两个术语。本书沿用惯例把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 (后者是从戴维·莱恩那里借用的。本书有时简称为“社会主义”, 纯属缩略, 并无理论含义)。这是一个不完善的术语, 但其缺陷似乎比其他可能采用的惯用语要少一些。

本书第三章的一部分已在《牛津经济文集》初次发表, 笔者感谢该文集编辑允以再版。

迈克尔·埃尔曼

1978年1月于阿姆斯特丹大学

* 为使中国读者不致引起概念上的含混, 中译本将“国家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t Countries) 一律译作“社会主义国家”。——译者注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剑桥现代经济学丛书》前言	3
本书前言	5
致中国读者的前言	8
第一章 计划工作的必要性	1
第二章 计划的编制	15
第三章 计划执行中的一些问题	39
第四章 农业计划工作	76
第五章 投资计划工作	105
第六章 劳动力计划工作	140
第七章 收入计划工作	167
第八章 消费计划工作	187
第九章 国际贸易计划工作	210
第十章 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结果	232

第 一 章

计划工作的必要性

国家管理和指导经济的理由，可适当地从两个方面即理论方面和经验方面来思考。

理论方面的思考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对整个经济学界，或有时是对“正统”经济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中心的问题。然而，“正统”一词是一个含混的术语。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所谓“正统”是大不相同的。在古老的剑桥大学和古老的克拉科大学，对“正统”的理解就很不一样。在中国，1978年关于什么是“正统”和1968年的理解也不一样。另一个经常被用来描绘经济学界的形容词是“资产阶级的”。在二十世纪，这个术语常常不是作为阶级和历史的分析工具来使用，而是用作粗俗的漫骂用语被滥用，并随之而来的是逮捕和关进集中营。鉴于这个事实，我发现这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快的术语。因此，我将选用一个地理概念，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界。这个学界源自十八世纪而至今仍繁荣不衰。

西方经济学界的观点

曼德维尔 (Mandeville) 是这个学界的早期杰出代表。他在1724年的著作中曾经阐述过他如下的著名见解：

既不是人们所天然具有的友善品质和慈爱心理，也不是人们由于理性和克制而能够具有的实际美德构成社会存在的基础，而是世界上我们称之为

为邪恶的东西（道义的和自然的邪恶）是重要的法则，它使我们成为社会的动物，它构成社会的坚实基础，构成了生活，并且无例外地维持着各种交易和就业。我们必须在那里寻求各种艺术和科学的真正起源。而且邪恶一旦停止，社会即便不是完全瓦解，也必将受到破坏。

在他的散文和诗篇中都表达了这种思想。他关于蜂房类似人类社会的描述是众所周知的：

坏事充满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然而整个世界依然是一座乐园。
对这种情形的祈祷就是如此，
他们的罪行之和便构成他们的伟大。

这种思想在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斯密写道：“我们不是从屠夫、酿酒工人或面包师傅的善行中，而是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期待我们的晚餐。我们不必为自己请求他们的仁慈，而只是要求他们自爱；而且决不要向他们提出我们自己的需要，而只谈论他们的利益。”他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保证追求各自利益的个人最终会以一种对社会来说是合理的方式汇成集体行动。从亚当·斯密时代到现在，大部分基础经济学的教学都致力于解释和阐述个人的邪恶构成离奇的善行的学说。学生们来听经济学讲座时，习惯于关心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等这些重大问题。他们的教师把他们的视野从市场上看到的这些邪恶现象引向注意许多个别的合理决定结合成社会的合理决定的这种社会的合理的过程。

顺便说说，应当注意的是，人们通过一系列全新的观察接受一种新的理论，而摒弃人们原先“观察到”的理论，这种过程并不是荒谬的，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如此。诚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心内容之一是用一种对劳动契约的观察取代另一种。在研究劳动价值理论之前，你可以“观察到”一个工人为雇主劳动几小